一、中共有關「中國式現代化」論述觀察

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副教授張弘遠主稿

- **習近平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講話定調，必須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將過去十年歸功於中共成功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突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地位。**
- **鄧小平改革開放後，中共的現代化歷程融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允許社會具有部分自由主義思想。習近平強調中國夢、民族復興，擘劃全方位現代化、超趕式文明進化，「以黨領政」模式或是中共超越西方經驗的關鍵；但黨國界線模糊化，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恐陷入相互擾動的循環當中。**

（一）習時期的中國現代化意涵

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是習近平在「十九屆六中全會」所提出的施政主軸，主要用以回應：「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兩個根本的政治問題，一方面是想要回答外界對於習近平主政下中國往何處去的質疑；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反思中國特殊之國情而欲選擇相適合的發展道路。

中國社會是一個從農業轉換至工業的社會，而中共的改革開放則是推動整體社會變遷進入當代文明的重要舉措，然而農業社會的底蘊、龐大的人口規模，再加上各國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構成了中共推動現代化時所可能遭遇的挑戰。而隨著中共新一輪高層權力接班展開，如何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又浮上政治檯面。在 2022 年 7 月 27 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強調「我們推進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鑑於即將召開的「二十大」，故而這次講話內容也被外界認為是解讀習近平對於中共政治任務的重要機會。

中共律定自身政治任務時，往往是從當前的形勢加以分析，而在本次講話中，習近平分析「十九大」之後中國所面對的情勢以「極不尋常」、「極不平凡」八字來加以概括，而這也是中共處理「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兩個內外局勢之後所產生的感想。對內，習近平認為中國以人民戰爭的方式來抗擊疫情，以強化中央管制權力的作法把握香港大局；對外，則是維護國家尊嚴與核心利益並與對手展開鬥爭。而中共目前面臨到四大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而這四項考驗也將長期存在，而總結當前的情勢之後，習近平替過去十年定下基調：中共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路徑

何謂中國式的現代化？習近平的答案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而這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則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那麼要如何落實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共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了戰略部署，基本上是分兩步走：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落實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工作上，習近平提示工作重點：未來 5 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搞好這 5 年的發展對於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至關重要，要緊緊抓住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而實現任務的關鍵則是在：「黨」。既然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的樞紐，也因此，習近平要求全黨深刻認識可能危及黨的領導的因素，也就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大危險，因此習近平把推進中國現代化的論述重點與從嚴治黨、黨的自我革命等黨建工作相互聯繫在一起。

習近平的發言重點是放在中國式現代化，並以此作為中共長期執政的合法性來源，然而各界對於本次演講的學習重點反而都是以「兩個確立」為中心，也就是強化對於習近平的領導權威的擁護。何以中共各界會把中國式現

代化與確立習近平領導權威這兩件事情當作連結關鍵？理解這一點應該就能掌握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特色。

（三）西方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比較

現代化往往是指涉社會變遷的現象，從原先傳統、封建與農業的社會形態，因為經濟上的工業化而推動社會的城市化，進而帶動政治民主自由的發展。由於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帶動技術創新的需要，進而也促使理性客觀與個人主義的價值發展，最終建構出一個迥異於前工業社會的文明樣貌與社會結構。這種現代化歷程主要是以西歐國家的歷史作為發展平台，而西方文明也因為現代化的成果而成為其他世界或文明體系借鏡取法的對象。然而這種結合工業資本、民主自由、個人主體等價值的社會體系以及所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在他國進行制度複製時無法一蹴可幾，必需先與該國社會主流價值與社會結構相互磨合，並設法在控制制度變遷成本的情況下建構制度轉型路徑來完成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可以從五四運動開始溯源，民主與科學作為當時中國現代化啟蒙的主要價值，在背後所想要解決的則是落後的國家處境，但長期封建與封閉的中國社會想要成功銜接西方現代化的路徑並不容易，無論是梁啟超的憲政主義或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然都是立足於當時中國的國情，但卻無法有力的化解外部的挑戰，最終中共則以列寧式共產主義作為思想核心而獲得主導國家發展的機會。然而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與列寧式共產主義並不相容，因此在毛澤東時期，中共主導的現代化結果便是重度摧殘傳統社會文化，雖然名義上共產主義成為中國的主導性思想，但實際上並未催生具有現代化意義的社會制度轉型。

在鄧小平改革之後，中國開始重新自經濟層面來再次推動現代化歷程，鄧小平的作法基本上是在經濟上推動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社會上則是有限度的允許自由主義思想，但在政治制度上則仍強調群體主義與中共權威，對此，吾人稱之為中國式「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由於這套作法主張經濟利潤需要與社會共享，而利潤分配則可透過市場或政府來完成，但

中共則將自身置於絕對主導的高度；換言之，中國式市場社會主義被侷限在經濟或社會層面，而政治資本的分配與運用仍是由中共作主。

然而這個現代化的作法在習近平時期又出現了轉折，習近平強調中國夢、民族復興，故而其所擘劃的現代化就不會只有經濟結構的現代化，而是一種全方位的現代化，是一種超趕式的文明進化，但又不能重複西方現代化的旅程，特別是在政治層面上的民主自由與個人主義，這將與中共政黨屬性與權力結構有著根本性的衝突。

雖然在經濟與社會的結構上，中國現代化有著明顯的西方進程身影，但在政治現代化上則採取抽換概念的作法，中共提出「人民民主」或「以人為本」的典範，想要以此與西方現代化做出區隔，並保留了中共永續執政的思想準備。在這個架構中，中共必須證明在頂層設計上的這套獨特作法，可以在經濟、社會或科技等結構上超越西方經驗，既可以擁有如西方社會的「現代性」特徵，又能夠從不同發展模式中達成更好的結果，如何確保這個預言的實現？對此，中國共產黨「以黨領政」的模式便成為答案。

（四）結論

中國式現代化的問題有二：一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路徑設計；二是現代化所欲建構的現代性內涵。從列寧式共產主義到市場社會主義，中共推動中國現代化是以社會主義為架構，這與西方現代化建構在資本主義路徑有所差異，自然在領導現代化的動力結構上也不相同。列寧式共產主義將推動的責任交付給先鋒性政黨，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則主要是由資產階級或統制階級來推動。中共所欲推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建政初期，毛澤東曾經採取階級鬥爭的策略，例如發動無產階級鬥爭資產階級來沒收生產工具、生產資料，但此舉造成極為嚴重的社會矛衝突，最終撕裂中國社會的發展共識。這個痛苦經驗讓中共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之後，謹慎地處理階級衝突，例如全力「維穩」、重視「三農」，到了習近平時期便引發再分配與三次分配的討論，但如何透過政策分配來調和經濟成長之後的貧富差距？如何確保國家不至於掠奪民間發展成果，又如何避免貪腐與政商尋租？

西方現代化過程所引發之社會矛盾，主要是依賴制度性安排（如司法、社福）來進行化解，但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矛盾則依賴政黨調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如此一來，黨與國的邊界逐漸整合，黨政中樞的角色更為吃重，故而在習近平的執政設想之中，黨便是國家現代化發展所有問題的答案。但這種強化政黨角色的作法框限政治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政治議題與改革進程被強制鎖定在現存位置，並不得妄議。故而讓習近平主政之下的中國式現代化內涵被侷限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層面，政治領域無法與經濟、社會相適應的有機發展，而在其他領域當中，過度延伸中共政治主導的角色，最終也導致此一模式的侷限性，進而造成中國式現代化將不斷的在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社會等領域陷入相互擾動的循環當中。